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李春青 李瑀平 主编

李春青 著

魏
清

晋
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7-309-04711-9

定价：12.00元

魏 清 晋 玄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三

魏 晋 清 玄

李春青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三

魏 晋 清 玄

(全套丛书共八册)

李春青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丰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65千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303-03271-1/I·387

定价：5.45元

总 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术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氏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高兴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甚至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标识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中、清谈品茗中、诗文酬唱中、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张扬我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

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中、节日庆典中、服饰装潢中、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精神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又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

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大影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的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从清议到清谈	(1)
	1. 清议	(1)
	2. 党人之议	(2)
	3. 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	(4)
	4. 清谈的勃兴	(5)
	5. 清谈的土壤	(8)
	6. 清议、清谈事例	(10)
二	清谈雅趣	(12)
	1. 清谈世风	(12)
	2. 清谈的形式	(13)
	3. 清谈的内容	(14)
	4. 谈家风致	(17)
	5. 清谈中的审美体验	(21)
	6. 清谈的标准	(23)
三	释“清”	(26)
	1. “清”的使用	(26)
	2. “清”与审美精神	(32)
四	谈“玄”	(37)
	1. “玄”谓何物	(37)
	2. “贵无”与“崇有”	(39)
	3. “贵无”与“崇有”的比较	(43)
五	阮籍其人其玄	(48)
	1. 阮籍其人	(48)

2.	阮籍其玄之一	(51)
3.	阮籍其玄之二	(55)
4.	阮籍其玄之三	(59)
六	嵇康其人其玄	(65)
1.	嵇康其人	(65)
2.	嵇康其玄之一	(67)
3.	嵇康其玄之二	(71)
4.	嵇康其玄之三	(74)
5.	嵇康其玄之四	(77)
七	“玄”与审美精神	(79)
1.	玄与社会心理	(79)
2.	魏晋审美精神	(85)
八	清玄世风与诗	(96)
1.	郭璞与“游仙诗”	(96)
2.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100)
3.	陶渊明与“田园诗”	(102)
4.	谢灵运与“山水诗”	(111)
九	清玄世风与书艺书论	(123)
1.	书体定型，书家辈出	(123)
2.	“二王”其人其书	(126)
3.	六朝书法中的审美精神	(133)
十	清玄世风与画艺、画论	(136)
1.	绘画勃兴的时代	(136)
2.	顾恺之其人其画	(138)
3.	山水画及山水画论	(141)
4.	“气韵”与“骨法”	(144)
十一	南北朝审美精神之异同	(147)
1.	北朝政治文化上的特殊性	(147)

2. 迥然不同的审美追求	(149)
3. 诗文书画的对比	(151)
十二 清玄世风中的帝王们	(160)
1. 帝王与名士	(160)
2. 帝王的名士风度	(165)
十三 魏晋南北朝的弊风弊俗	(174)
1. 怪吝与奢侈	(174)
2. 喜服食与信鬼神	(184)
十四 魏晋审美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193)
1. 文学艺术本体论	(193)
2. 文学艺术价值论	(196)
3. 文学艺术风格论	(204)
十五 结 语	(208)

一 从清议到清谈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学士的行为——大到立身行事，小到言谈举止，莫不与当时的清谈之风相关。清谈的蔚为风气，并非一朝一夕所致，溯其源头，汉季的清议实为滥觞。由清议而清谈，由清谈而玄言之风——一代风气由此而成。

1. 清 议

清议与汉代的选官制度有直接关系。如何跻身仕途，这是历代士人最为关切之事。春秋以前，自大夫以上俱为世袭，只有下层属吏方为选辟。诸如商汤聘伊尹，任以国政；文王访姜尚，委以军权之类，只是创业君主的例外之举而已。战国时代，由于战乱不已、政权不稳，统治者生存计不得不选任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士”来治国治军。于是，奔走游说、以布衣而为卿相的纵横家大盛。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穷困潦倒的苏秦终于得佩六国相印，范雎、蔡泽、李斯等人的相继相秦，都是靠得自己的才学见识。这种任官方式对天下士人而言自然是一种极大的刺激。战国有才之士那种睥睨一切、志吞八荒的豪迈气概，正是在这样的刺激、这样的机会面前产生的。

汉代的选官则有较多形式。除了大臣可保举其子弟为官乃为世袭制的变体外，主要则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察举征辟。举荐贤良方正乃是地方行政长官政务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地方行政长官根据什么来举荐呢？这根据主要是乡间间的舆论品评，而舆论品评的形成则有赖于那些在地方上有声望的缙绅们的清议。

所谓清议，也就是公正的评议的意思。它既是政府选用官员

的依据，又是这种选官方式的产物。因此清议作为一种对人物的品评，同时又有引导、规范、监督人的行为的作用。清议主要是对人的品德和才干予以评价。而品德的重要性又远远超过才干。因此，能否得到一个品行高尚的好名声就成了关乎读书求仕之人一生命运的大事。这样，清议也就成了文人学士人人瞩目的大事了。

清议既是对人物的评议，有时是以“风谣”的形式传诵的，如“五经无双许叔重”（对许慎的定评），“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对荀爽的定评）等等。有时，这种定评是清议中最有声望的人作出的。例如，曹操未显赫时，曾去寻访当时以品鉴人物著称的许劭。问他“我是怎样一个人？”许劭说“你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好雄”。这个回答使素有壮志的曹操大喜过望。可见其分量之重。

在清议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些有远见卓识、善于识人的人物。东汉桓灵时的郭太便是这样一个人物。郭太，字林宗，博学多才，因得士林领袖李膺激赏而闻名天下。他终身不仕，授徒讲学。《后汉书》本传说他“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以至于“太之所名，人品方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由此观之，郭太在评判人的品行才能上大约确有过人之能。这样他便成了清议的权威，自己虽身为布衣，但其寥寥数言却可决定士人们的进仕之途。《世说新语》中有一则郭太对黄宪的评议：“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由此可知，汉末的清议已不单单是对人的道德品行或才学能力的评定，其中已有对人物人格魅力即度量、器局等的品鉴。这与后来的清谈已无大的分别。

2. 党人之议

东汉乡间清议原本是察举征辟的舆论准备，但到了桓灵二帝之后，由于“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人进身之途受到阻遏，

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清议遂泛化为“党人之议”。当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便常聚集一处，指摘时政，互相标榜，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士人们既失望于当政，于是就褒扬那些立身清正的中下层官员及隐逸之士。当时太学生中流传这样的谣谚：“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目的自然是以清议的形式进行政治角逐。他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于是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号，以之标举那些士人的精神领袖。

乡间清议演化为党人之议，其政治内容当然有了本质的不同，然则就规范时尚、弘扬品藻之风而言，二者却又完全一致。在清议、党议的舆论影响下，士林中出现了一大批“名士”。他们大抵是那些立身清正、博学多才、政绩卓然的中下层官僚。因其多出身寒微，以举孝廉、举贤良方正之途步入官场，与宦官外戚之流相比更符合名教准则，于是在广大士人之中享有声誉。加上清议褒扬，便成一时人望。这种“名士”与放浪形骸、遁迹山林的魏晋名士有根本不同。他们尚有与大官僚抗争的勇气，有建功立业、维护名教的信心。这样，清议、党议所导致的时代思潮乃是一种拯救儒教颓势的伦理精神，尚未达到魏晋时那种向往人格独立、摆脱精神束缚的审美精神的层次。但从精神的发展进程来看，清议、党议毕竟为魏晋清谈做了必要的准备。

党人之议实因政治黑暗而起，就其目的而言无非是呼唤风清气弊绝的政治局面，以便给广大士子以顺畅的仕宦之路。但由于这种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潮直接危及了当政者的统治，因而势必遭到他们的仇视。这两种势力的冲突最终以著名的“党锢之祸”而告一段落。“党锢之祸”的缘起，正如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是一件似乎偶然的小事：士人领袖李膺为河南尹，豪族张成预料将有大赦，于是唆使儿子杀死仇人。李膺下令将张成之子收捕，恰于

此时遇赦当免其罪。素以疾恶如仇著称的李膺毅然将其处死。于是张成一伙便上书诬告李膺结交生徒、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疑乱风俗。朝廷正欲平息党议，苦于不得口实，得此机会，立即下令逮捕党人，获二百余人，后以“赦归田里，禁锢终身”结案。

“党锢之祸”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实权阶层相互冲突的结果，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欲以自己所奉行的理想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此后，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东汉政权也就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境地了。

3. 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

黄巾起义之后，乱世英雄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弱肉强食的军阀兼并战争中，那些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自然要奉行实用主义政策。曹操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几次三番的“求贤令”中，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之术。这自然激发起士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建安文坛的慷慨多气，志深笔长之风，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状态。“唯才是举”的用人之术并不重虚名，即使品行不端而有真才实学亦可获重用。例如曹操的高级幕僚郭嘉就是一位“不治行俭”却有大才的人，曹操对他极为器重。而对于那些崇尚虚美之名而无济世之才的名士，则或者杀掉（孔融），或则贬黜（崔琰、祢衡）。曹操的政策，对清议的延续，无疑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然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之术到了曹丕执政之时却被废弃，代之而起的则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一种选举制度，与当时曹魏政权对北方的统治已较为稳定，需要一种固定的用人制度有关。但这种制度一经实施，很快便成了在地方上拥有极大势力的世家大族恢复自己

汉末以来受到打击的政治地位的有效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获取了州郡大中正、中正之职，因而也就控制了对人物品级的评定。于是评判品级“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的初衷，便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所取代了。

由于有权为士人做出“品状”——定评的中正、大中正之职基本为世家大姓所控制，因而“乡论”——乡间清议就进一步受到冲击，以至出现了“使天下无复清议”（见《晋书·傅玄列传》）的局面。于是在晋初便有人提出“尽除九品中正之制，使举善尽方，各由乡论”（《晋书·卫瓘传》）的主张。这实际上是欲恢复东汉的清议。然而随着司马氏的掌权、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有利于庶族士人进身的乡间清议再也难成气候了。

然而对于魏晋清谈时尚的泛滥而言，九品中正制却成了一种促进因素。这是由于，第一，将人按品分等的做法，在客观上促进了东汉已然出现的人物品藻的风气。第二，名士们的议论既已不再成为政府察举征辟官员的主要依据，它便流于一种纯粹的时尚——为议论而议论，也就完成了由清议到清谈的过渡。清谈不再以实用的政治动机为核心，而是成了士人们追求虚美之名的风雅之举，成了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精神活动。

现在我们已然明了，汉代清议本是政府选拔官员的舆论依据，是士人仕途的必要准备。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它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由于东汉号称以名教治天下，故而清议的标准只能是儒家的伦理规范。清议中出现的名士，也是那些在立身处世上恪守儒家伦理准则的士人。党人之议是乡间清议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变体，其内容尽管早已超出清议范围，达到了“上议执政，下讥卿士”的政治批判的高度，但其根本目的并未超出儒家政治伦理所允许的范围。乡间清议、党人之议接连受到“党锢之祸”、“唯才是举”、“九品中正”等屡次打击，终于失去了其为政府提供候选人才的功能，而演变为一种纯粹的“清言”。

4. 清谈的勃兴

如果说清议是一种非官方的政治行为，那么清谈则是一种时代风尚。但清谈既从清议中衍变而来，它自然要带有清议的遗留。这种遗留便是“臧否人物”。清谈的发生正是以品评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以往有的论者认为，既然清谈的内容与清议一样，也是品评人物，那就应称为清议而非清谈。只有晋代的那种以“三玄”为谈资的清谈才是真正的清谈。这种辨析其实是不确的。清谈与清议的分别主要并不在所谈内容，而在其功能上。清议的品鉴人物是为官方选拔人才提供依据，清谈的品鉴人物主要是表达一种伦理的或审美的识见。因而在品评标准上，清议更重德才，而清谈则更重人物给人的整体感受。例如：

五经纷纶井大春。

（《后汉书·井丹传》）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后汉书·王允传》）

这两则人物品鉴，一言儒家理论修养，一言人物的才干，自然是清议无疑。而：

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世说新语·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世说新语·赏誉》）

这两则评语是讲人物风范给人的审美感受，自然是清谈而非清议。

汉末士人如为清议所许，则获得进身之阶，接着便会被征辟选任。魏晋的士人如为清谈所赏则获得名士称号，进而进入清流，即获得一种社会声誉。至于是否可以仕进，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要而言之，清议与清谈的分别，一是看其功能如何，二是看其是否

关乎名教。清议臧否人物须善善恶恶；清淡臧否人物则美美丑丑。说清淡突破清议的伦理层次而跃入审美境界，正是指此而言。

清淡误国乃是旧史家的定评。而对清淡大兴的罪责，人们往往归之于西晋大官僚王衍。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桓温驱师北伐，直至西晋故都洛阳，他与群僚佐站在船楼之上，放眼远眺，见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不仅感叹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废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那么这位王夷甫是何如人呢？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原北方大族。从兄王戎乃晋初大名士，“竹林七贤”中的人物。弟王澄亦有声誉。据《晋书·王戎传》载，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小时候曾去拜访山涛，山涛在他走后说，“将来误天下百姓的，也许正是这个人。”年纪不大，他在京师就很有名气，得到当时的名臣羊祜及从兄王戎相当高的夸赞。连晋武帝都颇闻其名。年稍长，王衍以其博雅之才，翩翩风度活动于名士公卿之间，“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此时，恰逢何晏、王弼的老庄之学渐受推重，王衍又以好论纵横之术，转而谈玄析理。才学、容貌、风度、气质均为上乘的王衍，常常手执白玉柄的麈尾，探讨玄理、辨别谬误，被时人称为“口中雌黄”。他的言谈举止很快引起洛中士子的效法模仿。王衍既负盛名，又累居显职，于是乎“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戎传》）

王衍虽然“口不论世事”，以清拔脱俗自矜，但他于政治斗争亦有一套应付裕如的经验。历任中领军、尚书令等重职。屡踏屡起，总不离宰辅之位。这在“贾后擅权”“八王之乱”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殊非易事。考其原因盖因其务求虚诞之名，而远离实际的政务军事之故。正因其不预世事，惟贪虚名，所以在其随东海王司马越征讨荀晞，当司马越死于军中，人们推王衍为元帅时，他竟“惧不敢当”。致使全军为石勒所破。王衍也成了俘虏。